

【 中国近现代
高等教育研究
丛书 】



周川◎主编

权力的表达： 中国近代大学教授权力制度研究

张正峰◎著

QUANLI DE BIAO DA:

ZHONGGUO JINDAI DAXUE JIAOSHOU QUANLI ZHIDU YANJIU



福建教育出版社

周川◎主编



权力的表达： 中国近代大学教授权力制度研究

张正峰◎著

QUANLI DE BIAO DA:

ZHONGGUO JINDAI DAXUE JIAOSHOU QUANLI ZHIDU YANJIU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权力的表达：中国近代大学教授权力制度研究/张正峰著.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7
(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研究丛书)
ISBN 978-7-5334-4744-1

I. 权… II. 张… III. 高等学校—教授—教育制度
—研究—中国 IV. G64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2698 号

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研究丛书

权力的表达：中国近代大学教授权力制度研究

周 川 主编

张正峰 著

出版发行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350001 电话：0591—83726971
83725592 传真：83726980 网址：www.fep.com.cn)

印 刷 福建二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三明市新市中路 70 号 邮编：365001)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15 千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34-4744-1

定 价 21.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向出版科 (电话：0591—83726019) 调换。

序

周 川

—

中国近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始于 19 世纪中后期，下限大约在 20 世纪中叶，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

这一个世纪，是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时期，也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转型的时期。“半封建”与“半资本主义”、“半殖民地”与“半独立”、新与旧、中与西、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反动，这些对立因素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构成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社会大环境，决定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在重大社会转折期特有的矛盾，也决定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特殊的发展道路。一方面，是近现代高等教育登峰造极的种种矛盾和乱象，例如旧北京的“八大胡同两院一堂”，此起彼伏的校长风潮、校名风潮、索薪风潮、“脱部”风潮，当然还有军阀政客对高等教育的恣意摧残和蹂躏等等。另一方面，也正因为环境的艰险，反而映衬出近现代高等教育取得的任何一点进步和成就的来之不易，筚路蓝缕的先驱者们为当时中国高等教育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的不同凡响。例如，为了维护大学自治和自由，儒雅的北大校长蔡元培面对北洋政府的淫威，挺身而出向全社会宣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又如抗战期间，许多大学颠沛流离，师生饥寒交迫。西南联大像梅贻琦、闻一多那样的名校长、名教授也不得不靠售卖太太的女红或是代人刻章以维持生计。然而，在那样的艰难困苦之中，师生们却“同艰难、尽

笳吹”，修业乐道，弦歌不辍。难怪李约瑟盛赞，那些为避战火而迁徙到深山沟里的大学，简直就是“东方的剑桥”。在李约瑟看来，如此艰难环境中办出如此成就的大学，不啻于教育的奇迹！总之，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就是在这矛盾的两极之间艰难地孕育和发展。在那里，我们既能看到忠君尊孔和“党化教育”方针，又能看到“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术纲领；既能看到战火延绵、政局动荡而造成的乱象，也能看到应规蹈矩、循序渐进的秩序井然；既能看到“封建、买办、法西斯教育”的阴影，又能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看到科学、民主、自由力量的生长和种种教育奇迹的涌现。

环境动荡艰险，道路曲折坎坷，内容丰富多彩，成败泾渭分明，这就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为后人留下的一笔独特的历史遗产。这笔历史遗产，无论是“教育的奇迹”还是乱世的牺牲，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它都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有意义的典型案例，也是中国近现代特殊社会的真实缩影。然而，对这笔历史的遗产，我们显然尚未给予应有的重视，也没有认真系统地加以总结，因而对它的本来面目我们还所知甚少。今天，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更多的是那个特殊年代大学内外的种种“故事”和“掌故”，还有许许多多的“奇闻轶事”。故事多，轶闻多，说明了这段历史有丰富的内容，有流传的价值，最起码说明在今天看来还是很新鲜。但是，我们显然不能仅仅停留在“故事”的层面上来继承这笔历史遗产，也不能仅仅以讲故事的心态来对待它。这笔历史遗产的珍贵意义在于，一方面，它构成了一个内容极为丰富并且极具挑战性的研究领域，需要我们用科学的态度和理性的工具去爬梳整理、系统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还原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本来面目，揭示世界高等教育史上这个特殊案例的真谛，以进一步丰富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另一方面，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昨天，它是历史的存在，是今人可以对照的一面历史明镜。因此，对于当下中国高等教育来说，研究这一段历史，总结其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以弘扬优良传统，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也不失其现实的意义。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以苏州大学“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点和省级重点学科为依托，组织相关方向的教师和博士研究生，撰著了这套

“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研究”丛书。这套丛书肯定无力承担系统总结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历史经验教训这样宏大的主题，它只是选择了这段历史中几个具体的点或线作为研究对象，主要运用文献研究的方法，旨在厘清事实，还原真相，描绘路径，透视背景，分析因果，评价功过，论证意义。即便是这样，对于大多侧重于教育学背景的各位著者来说，仍然是一个充满了挑战性的高难度目标。但是，我们坚信“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的古训，坚信了解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对于当下中国高等教育的深远意义。同时我们也坚信，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本着以勤补拙的态度，发扬钻研精神，愿花大力气，肯下笨工夫，我们所做的工作就一定能取得钝学累功的效果，也一定会产生积极意义。因此，我们敢于不揣浅陋，将这套丛书奉献在所有关心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问题的读者面前。

二

张正峰博士《权力的表达：中国近代大学教授权力制度研究》一书，是一部研究中国近代大学教授权力问题的专著，是著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

教授权力似乎可以分为性质全然不同的两个方面，一是教授在教学过程中所具有的权力，或者称之为教学权力，如对教学内容选择权，对教学进度的决定权，对学生考试成绩的评分权等等。这些权力是职务内在地赋予教授个人的，虽然也有合理运用和防止滥用的问题，但其合法性基础毋庸置疑。另一是在学校管理决策方面的权力，如在学校大政方针和规章制度的制定、校院系领导人选的提名选举或罢免、学科专业与组织机构的设置与变更、学校经费的预算与使用等方面，教授所拥有提议权、决定权或否决权等等。这些权力可以称之为教授的校政权力，按照本书的界定，也就是“教授拥有的对大学统治、控制和事务决策的权力”。本书所探讨的，正是这后一种权力。

教授的校政权力，是一种复杂的权力现象，它的合法性在理论上并未得到充分的论证。就教授的本职看，教授个人并没有“统治、控制、管理”大学的职责，除非他当了校长或是什么部门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身份实际上主要已经不是教授了。这应该是另外一个课题研究的问题)。蒋梦麟的“校长治校、教授治学”说,也不是毫无道理。然而,西方大学经过近千年的历史积淀,“教授治校”却已然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大学精神,成为一种牢不可破的办学传统。教授作为一个群体,它在校政方面显示出来的种种权力,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尽管这种权力因国家和时代的不同而表现出很大的差别,但是,它的存在却是不能否认的事实,而且对这种权力可能产生的作用,也是任何人都不能小觑的。这就可能使人们产生这样的疑问:大学管理本应是校长、董事会,或其他什么管理机构的职权,为什么专事教学科研的教授也能跻身其间呢?为什么政府的职员、剧团的演员、工厂的工人等等,在本单位的管理决策方面都鲜提“权力”,顶多只是争取民主“权利”的问题,如“知情权”、“发言权”等等,而独独大学教授却不仅要“权利”,而且还会要求“权力”呢?说到底,这正是大学这种机构的特殊性所在,是大学与其他机构与众不同的地方。因此,研究大学教授的权力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对峙这种权力本身,而且还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大学这一机构的特殊性质和大学管理活动的特殊逻辑。

中国近代大学,刻意模仿西制,教授权力也成为大学校政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当然也常常成为一个棘手的难题。本书以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法规、大学章程和事件记录为基本文献,比较深入地研究了教授权力的生成与表达问题。全书辨析了法规文本的相关规定及其演变历程,叙述了教授权力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分析了教授权力与校长权力、董事会权力、政府权力之间复杂的关系,揭示了民国大学教授权力的具体表达方式和运作过程,阐明了代议制组织的局限性,提出了通过全体教授意志来表达教授权力的制度构架。著者对教授权力的群体性质是有明确意识的,本书虽然没有对“教授”概念进行界定,但“教授”在书中显然是作为一个集合概念而不是作为一个个体概念使用的,因而“教授权力”实际所指,也便是教授作为一个群体而不是某一个体所拥有的权力。在此前提下,本书以评议会和教授会这两种可以表达教授权力的组织形式作为分析对象,通过对教授在评议会中所占的席位及其所占全校教授总体比例的分析,以说明教授权力在校级最高权力机构中的份额和代表性。同时,通过

对教授会大多建在院级的事实及其职能的分析，以说明其局限性。这样的研究思路，清晰且可行，许多生动的事件案例也增加了本书的可读性。

由于教授代表在校评议会中基本是少数，而教授会由于其职能限制也“无法承担起真正实现教授权力的重担”，因此本书的一个判断是，近代教授的实际权力，还“不尽如人意”。这一点从本书的字里行间隐约可以读出。然而，著者的这一判断，主要不是以对“尽如人意”的教授权力的界定，而主要是以西方教授权力生成过程的某些极端情况为参照系作出的，因此，这一判断未必很准确。单就本书浓彩重墨描述的北大“脱部事件”和清华“驱吴事件”而言，当时的教授权力似乎已是够大的了，应该是很“尽如人意”了。对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我们似乎不应存有太高的奢望。再说，即便是在西方，教授权力也会因国家和时代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从参与最基层的学术事务，到“完全控制高等教育所有层次”，伯顿·克拉克在其著名的比较研究中，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各个层面上的典型国别案例。因此，对于中国近代大学教授权力状况的判断与评价，还是应该基于对大学教授权力性质与合理限度的界定，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来进行，这样可能会更实际、更贴切一些。这个问题需要著者在以后的相关研究中进一步深化。

2007年4月20日

目 录	
绪 论	(1)
一、选题的理由	(1)
二、文献综述	(3)
三、研究构想	(7)
四、研究及写作方法	(8)
五、对权力、教授权力以及教授权力制度的一点说明	(12)
第一章 近代大学教授权力制度的发展演变	(17)
第一节 近代大学教授权力制度的萌发	(17)
第二节 近代大学教授权力制度的确立	(24)
第三节 近代大学教授权力制度的发展	(38)
第四节 董事会制度与教授权力的关系	(62)
第五节 小结	(69)
第二章 教授权力的运用及体现	(71)
第一节 对教育总长权威的挑战： 以北大“脱离教部”事件为例	(71)
第二节 与校长权威的较量：以清华“驱吴运动”事件为例 ...	(81)
第三节 在学校日常管理中的体现： 以西南联大校务会议和教授会会议记录为例	(92)
第四节 小结	(98)
第三章 对近代大学教授权力制度的反思	(100)
第一节 教授代表能否影响校务决策	(100)
第二节 教授代表能否代表教授	(125)
第三节 教授会能否成为实现教授权力的制度平台	(133)

第四节 小结	(137)
第四章 制度背后的权力争夺	(139)
第一节 清华大学内部的权力争夺	(139)
第二节 北京大学内部关系分析	(148)
第三节 其他大学内部权力斗争略论	(160)
第四节 小结	(166)
第五章 总结与思考	(169)
一、教授权力的获得或教授权力制度的建立:	
主动斗争或被动接受	(169)
二、教授权力的保障或教授权力制度的维护:	
个人权威或团体组织	(178)
三、教授权力实现的两难问题:民主或效率	(184)
四、一点建议和希望	(187)
参考文献	(191)
附 录	(200)
后 记	(209)

绪 论

一、选题的理由

(一) 对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回应:

2000年4月,东北师范大学进行了校内管理体制改革的尝试,比如建立院(系)教授委员会等,这些改革措施当时没有引起外界太大关注。2003年5月12日,北京大学推出的《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在国内和海外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讨论,而且在改革方案第二次征求意见稿(2003年6月16日)的第44条中规定:“为发挥各单位教授在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中的作用,各院系在学术审议中建立‘教授会’评议制度,对聘任教师和教师职务晋升进行民主评议”,明确地将“教授会”评议制度引入高校人事制度改革,从而引发了有关教师,尤其是教授在高校管理中应该具有怎样的地位和权力的讨论高潮。

“教授会”这个名词是我国学习西方现代大学制度而引入的,首先出现在民国元年公布的《大学令》中,并且首先由蔡元培在北京大学设立。从1912年直至1949年的这一时期内,教授会这个组织在我国大学内部管理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正如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所认为的,“在教育界,与现实相联系的历史著作很少,反映现实问题但缺乏历史深度的著作却很多。”^①我国目前的研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即缺乏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就是为了弥补此缺憾,联系当前我国的大

^① 约翰·范德格拉夫等,《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王承绪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13。

学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进行的一项历史研究。我们现在所要进行大学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不应该仅仅从西方直接寻找证据，而更应该从我国历史上寻找改革的经验，因为我国近代已经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大学制度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尝试。而这些尝试更能为我们今天的改革提供有意义的经验和启示。

（二）理论研究的需要：

鸦片战争之后，国门被迫打开，从此中国开始了一段因屈辱而自强的历史。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之下，清政府在学习西方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由此就会存在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西方的思想制度体系在我国是如何发展和发挥作用的？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 R. Reynolds）在他的《黄金十年与新政革命》一书中认为：“在1898年百日维新前夕，中国的思想和体制都刻板地遵从了中国人特有的源于中国古代的原理。仅仅12年后，到了1910年，中国人的思想和政府体制，由于外国的影响，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最根本含义来说，这些变化是革命性的。在思想方面，中国的新旧名流（从高官到旧绅士、新工商业者与学生界），改变了语言和思想内涵，一些机构以至主要传媒也藉此表达思想。在体制方面，他们按照外国模式，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建立的政府组织，改变了形成国家和社会的法律和制度。如果把1910年中国的思想和体制与1925年以至今天中国相比较，就会发现基本的连续性，它们同属于相同的现实序列。另一方面，如果把1910年和1898年年初相比，人们发现，在思想和体制两大领域都明显地彼此脱离，而且越离越远。”^①我国学者桑兵也认为：“任达所陈述的知识与制度根本转变的事实，却是显而易见，不宜轻易否定的。”^②也就是说，中国人百年以来的观念世界与行为规范，与此前的几乎是两样。高等教育自然也具有这样的变化，蔡元培在《教育大辞书》之“大学教育”词条中指出，“吾国历史上本有一种大学，通称太学，最早谓之上庠，谓之辟雍，最后谓之国子监。其用意与今之大学相类，有学生，有教官，有学科，有积分之法，有入学资格，有学

^① 任达，《黄金十年与新政革命》，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215。

^② 桑兵，《晚清民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90~91。

位，其组织亦颇似今之大学，然最近时期，所谓国子监者，早已有名无实。故吾国今日之大学，乃直取欧洲大学，在拉丁文原名，本为教者与学者之总会（Universitat Magrotrorum et Scholarium），其后演而为知识之总汇（Universitat Litterarum），而此后各国大学即取其总义为名。”^①但是，西方的思想制度体系将在中国这样一个不同于西方的环境中发挥作用，这个过程又是如何进行的？这些制度在我国近代大学^②中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在此过程中又存在哪些方面的问题？本书试图把我国近代大学所建立的教授权力制度作为一个切入点进行一些研究，即探讨我国近代大学教授在大学管理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也是关切到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问题。

二、文献综述

大学教授权力制度主要在下列几个方面的研究中有所涉及：

（一）关于大学教师或教授的研究。

对于大学教师或教授的研究近年来呈增多的趋势，这主要包括下列几个方面：1. 有关大学教授的精神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关于大学教师或教授是否是知识分子？或者大学教师或教授应该具有怎么样的社会关怀？比如2005年南京师范大学王全林博士的博士论文《“知识分子”视角下的大学教师研究——大学教师“知识分子”精神式微的多维分析》。2. 大学教授培养方面的研究，主要探讨了如何推动教授和教授群体发展以及探索中国研究型大学建设的有效途径。比如华中科技大学的王怀宇博士的博士论文《研究型大学的教授与教授群体》。但对于教师或教授在学校具体管理中应该具有怎样的地位却很少涉及。

（二）关于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和教授治校方面的研究。

^① 唐钺、朱经农、高觉敷主编，《教育大辞书》，商务印书馆1930，42。

^② 实际上绝大多数学者都把1840～1949年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对象。（可参考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光明日报》，1998-2-3。）因此，本文主要把1912～1949年间的中国大学教授权力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也简单论及1912年之前所建立的高等学堂的内部管理情况。

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www.cnki.net) 自 1979 年至 2005 年 12 月所收入的论文中, 以学术自由为关键词进行搜索, 命中 1248 篇。而标题中含有“学术自由”的论文也有 138 篇, 其中有 127 篇是 2000 年以后发表的, 可见这已经成为当今一个热门话题。但这些文章主要从学术思想方面进行了论述, 很少涉及制度层面的问题, 即学术自治以及教授治校的问题。而以“学术自治”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也有 243 篇, 其中主要谈学术自治问题的有: 严海良的《学术自由、大学自治与宪政》(《学术论坛》, 2005 年第 2 期)、马凤岐的《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高教探索》, 2004 年第 4 期)、孔垂谦等的《西方现代大学学术自治的制度环境基础: 一种政治社会学分析》(《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4 年第 4 期) 和杜驰的《略论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限度及其制度性保障》(《现代教育科学》, 2003 年第 11 期) 等 13 篇。这些文章从思想到制度方面都进行了论述。而以“教授治校”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有 139 篇, 直接谈教授治校的就有 17 篇。其中张金福的《论梅贻琦“教授治校”理念的文化意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2 年第 4 期)、袁征的《中西教育发展的差异与蔡元培推行教授治校的尝试》(《浙江学刊》, 2002 年第 6 期) 和陈发美的《蔡元培的“教授治校”思想与实践》(《有色金属高教研究》, 2000 年第 6 期) 等文章, 探讨了我国近代教育家们的教授治校思想。这些研究无疑使笔者开拓了视野。但是, 他们的研究有的侧重现实问题, 有的侧重于思想, 而对于制度, 尤其是我国近代大学教授治校问题都没有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既然我国近代已经有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就不能一味闭口开口谈西方, 而不挖掘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本书就是试图弥补这方面的缺憾。

(三) 有关学术权力方面的研究。

近年来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关于学术权力的讨论也逐渐成为一个热点。从目前发表的文章来看分两类: 一类是涉及对学术权力概念本身进行的分析, 比如孔明的《对学术权力的再审视》(《现代大学教育》, 2004 年第 1 期)、张珏的《关于学术权力概念的界定》(《高等教育研究》, 2000 年第 5 期)、张艳和梁戈的《西方大学教授权力的合理性分析及比较》(《比较教育研究》, 2000 年第 6 期) 以及别敦荣的《学术管理、学术权力等概念释义》(《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0 年第 2 期) 等; 另一类是学术

权力与行政权力作为高校内部中存在的两种权力在学校管理中如何处理的问题。比如陆依凡的《论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协调》(《现代大学教育》, 2001年第4期)、武立勋等的《对大学组织特性及行政与学术权力关系的思考》(《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3期)、谢安邦等的《高校的权力结构与权力结构的调整——对我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高等教育研究》, 1998年第2期)等。这方面的研究专著或博士论文有别敦荣的《中美大学学术管理》和张德祥的《高等学校的学术权利与行政权力》等。这些研究都涉及教授权力问题, 因为在对学术权力概念的界定时, 一般把教师作为权力的主体。^①但这些研究主要还是停留在一般概念的讨论上, 尤其是侧重于概念逻辑上的推理, 或者是直接套用西方的名词(姑且不去谈对西方名词的理解是否有误, 后面再详谈)来分析我国现实, 就难免有隔靴挠痒之嫌。

(四) 教育史方面的研究。

可以分为下列几个方面: 1. 教育史研究方面的著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在通史研究方面, 目前已经出版的著作不下20本之多,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毛礼锐等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孙培青主编的《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陈学恂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李桂林主编的《中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以及主要在制度和管理方面的著作如李国钧、王炳照等主编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和孙培青主编的《中国教育管理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等等。而在高等教育通史研究方面, 目前有三部著作: 余立、郑登云编著的《中国高等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1994年版)、熊明安著的《中国高等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和涂又光著的《中国高等教育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2. 近代教育史研究方面, 有李华兴主编的《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熊明安著的《中华民国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以及台湾陈启天著的《近代

^① 这个问题目前还是存在一些争论, 请参考康全礼的论文《高校学术权力研究综述》(《江苏高教》, 2004年第2期)。

中国教育史》（台湾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等等。而近代高等教育史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霍益萍著的《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金以林著的《近代中国大学研究：1895～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以及台湾陈能治著的《战前十年中国的大学教育（1927～1937）》（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等。3. 近代大学专题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周川、黄旭主编的《百年之功——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的教育家精神》（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和许美德著的《中国大学 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当然她的论述延续到当代，但对于近代的研究还是很有启发性的）。对高等教育进行专题研究的还有厦门大学朱国仁的博士论文《西学东渐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华东师范大学苗素莲的博士论文《中国大学组织特性历史演变研究》和荀渊的博士论文《中国高等教育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对 1901～1936 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变革的考察》等。这些著作都对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形成及发展过程进行了描述，但对于高校内部管理却很少涉及，即使是专门进行制度和管理体制研究的著作也仅仅是一些宏观研究，基本上没有涉及大学内部的具体管理细节，尤其是关于教授在大学管理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的问题更是极少涉及。令人遗憾的是，这类研究过于偏重“典章”，即制度方面的描述，往往忽视了政策、制度或措施的落实情况。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在现实生活中，一种政策未必能够真正的落实；落实之后，在操作方面，也往往随着实际环境的变化而有所损益。因此，对于历史学来说，政策‘落实’的情况常常更重要。一个社会真实而复杂的情形，只有通过政策、制度与措施的落实和操作的情况才能得以展现。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注意那些更基层的、个案性的研究。”^①而本书正是一项基于个案性材料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各个大学的校史资料）。4. 校史研究方面，目前各个大学一般都已出版了自己的校史（志），比如萧超然著的《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的《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 1981 年

^① 王东杰，《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三联书店 2005，9。

版)、王德滋著的《南京大学百年史》(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以及复旦大学校史编写组编的《复旦大学志》第一卷(1905~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等。在这些研究中更常见的状况是,“使校史更多地带上了‘革命史’的色彩”,反而忽视了大学内部管理中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以至于我们无法了解当时的大学内部管理是如何运行的。但也有比较细化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如王东杰的《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三联书店 2005 年版)和苏云峰的两卷本著作《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中国高等教育研究》(1911~1929)、(1928~1937)(三联书店 2001 年版)。这两部著作都涉及大学教授为了自身利益在学校管理中进行的权力斗争。这应该说是目前对教授权力涉及比较多的研究著作,但由于他们限于自己的研究目的,因此这方面的研究也仅仅是片面而不系统的,对于学校内部管理的过程的揭示显得不够充分。不过,以上研究还是给本研究带来很大的启发,笔者从中受益匪浅!

另外,目前我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整理编辑工作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比如已经出版的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教育)》(第三辑、第五辑)(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1994、1997)、朱有珮编的《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3~1993)、陈学恂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潘懋元等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3)、琚鑫圭等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1)以及北大、清华、南大(指南京大学,下同)、交通大学等校编辑出版的校史资料汇编等。这些资料无疑给本研究带来了丰富的资料。但由于本研究侧重于大学内部管理过程,因此主要还是借助了北大、清华等校的校史资料。

三、研究构想

(一) 研究要达到的目标:

本研究定位于对我国近代大学教授权力制度的历史发展进行研究,即